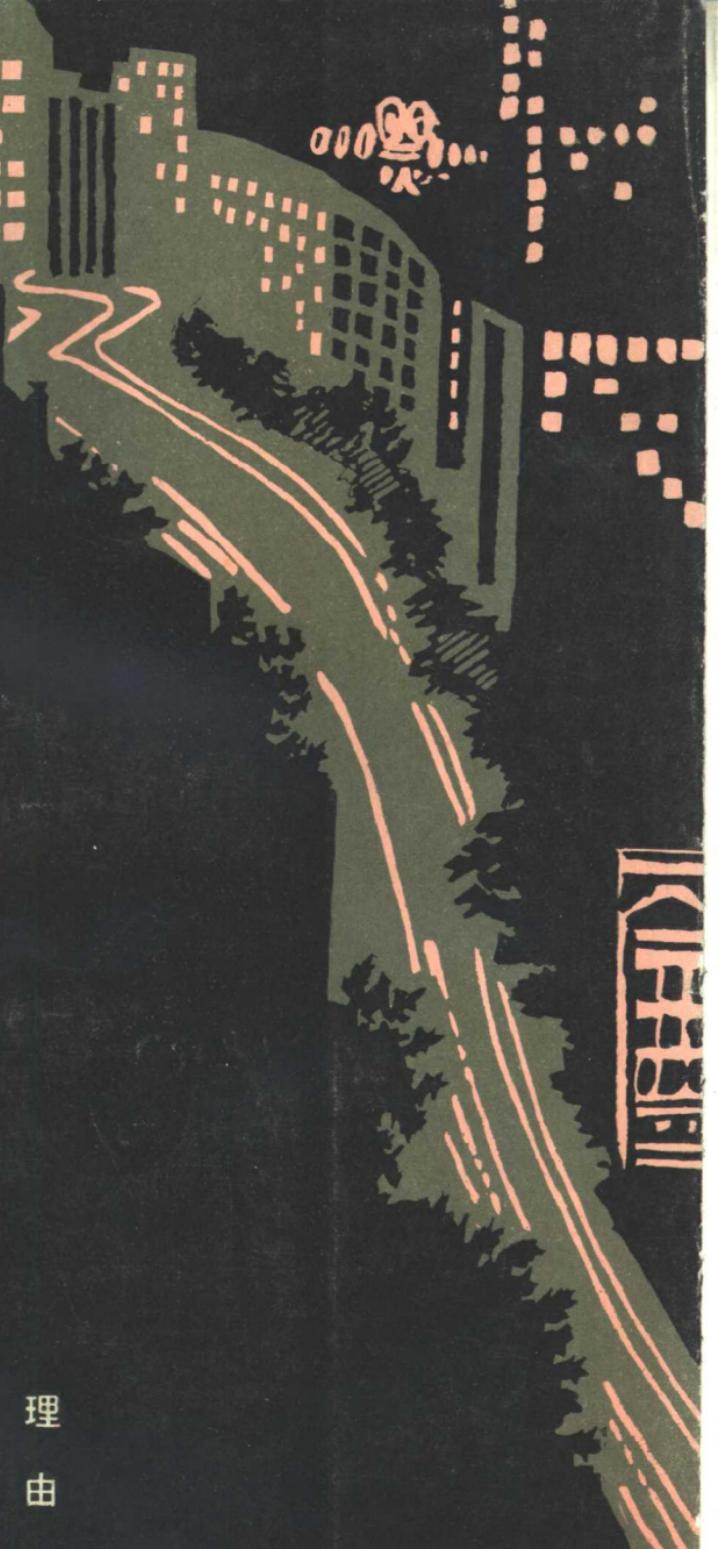


香港雨傘

理由



理由著

香港雨霏霏

香港雨霏霏

理由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32开本 4.375印张 73千字 插页 2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327 定价：0.45元

印数：00001—98000册

内 容 提 要

本书系作者应邀赴香港讲学，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时的所见所闻。作者满怀爱国主义的激情，通过自己的真实感受，对香港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及风土人情，作了较为深刻的剖析，形象地展现了香港当前存在的社会矛盾。作品语言生动、活泼。值得一读。

目 录

引子	(1)
劝告	(3)
想起马雅可夫斯基	(6)
大学宾馆	(9)
初会李先生	(13)
“横向”交流	(16)
新伙伴	(22)
途经跑马场	(26)
买路钱	(30)
“福临门”	(34)
木屋区事件	(37)
鸡尾酒会上	(42)
游园惊梦	(46)
以纯应杂	(49)
在崇基学院的演讲会上	(55)
沙田画舫	(59)
向扒手道“对不起”	(64)
拂袖而去	(67)
抒情诗之夜	(71)
孙博士和李夫人	(75)

水泥岛上植树	(81)
“你向往自由吗？”	(88)
女人街	(94)
回首罗湖桥	(99)
除夕夜	(105)
初一即景	(112)
萧条中兴隆的色情业	(115)
黑社会一瞥	(119)
香格里拉	(123)
太平山顶	(129)

引 子

北京，一个少有的暖冬。

数九前，飘过一场似雪非雪的银粉末，落在地面，象一层薄薄的白霜，很快就融化了。不久刮来一场寒流，显露冬天的威严，人们纷纷取出新式的鸭绒服、传统的小棉袄和厚重的皮大衣去抵御凛冽的西北风。没想到老天爷虚晃一枪，狂风在高大的楼群中打了几个忽旋，就迈着匆匆的脚步，消失在遥远的天穹。往后竟一日比一日暖和，大多是风和日丽的好天气。眼下是腊月，再过十来天就该过年了。往年正值滴水成冰的隆冬季节，而北京的气候却与江南的冬天差不了多少，推开窗扉，柔软的、湿润的、缠绵的风，徐徐拂面。

有人说，这是因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升高的缘故。西方的学者认为，这是海洋回流的周期性的“尼诺”现象。

徐迟同志刚从武汉赶到北京，我去宾馆看望他，他笑着说，他对北京的冬天估计过高了，携来许多防寒的装备，抱怨自己的手提箱太重。贺祥麟同志从桂林飞到北京，一见面，带来怪异的

新闻，说是这几天云南正在下雪。哎！不知老天爷怎么搞的，南辕北辙，乱套了。

晚上，扭开台灯，映出写字台上放着的一张中、英文学交流研讨周的日程表，列着这样一个项目：“二月十一日，星期四，晚上七时三十分，在香港艺术中心，主讲人徐迟、理由、贺祥麟，讨论会将讲及于三十年代发萌、蓬勃于七十年代末期的重要中国文学风格，三位来自中国的杰出学者将讨论这种名为‘报告文学’的特色”。

主办者对中国报告文学发展的概括言简意明。但“杰出学者”的称谓，显然是溢美之辞。或许出于香港文化界礼貌性的称呼，或许出于其它考虑。这张日程表的后面注明入场券每张港币十元——相当于在内地看十场电影的价格。

我这是第二次应邀去香港讲学。第一次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的下旬赴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会。那次会议的日程也很有趣，开完会安排了几天观光、宴请和公开演讲，阳历年在九龙红磡车站登上火车回内地。去年元旦，我是在广州的宾馆里度过的，孤独、寂寞、百无聊赖，领略了古往今来多少文人们描写过的驿馆乡愁。我并无埋怨香港主人之意，我理解了香港人办事就是这个习惯：干脆、痛快，有事办事，没事一刻也不挽留。

其实，这样办事的风格是值得欣赏的。

中国作家协会体恤作家们的心情。这次经与

香港方面交涉，在艺术节的活动结束后请作家们在香港多留几天，免得春节期间受迁徙之劳，滞留时的费用由内地负担付汇。

在中国人的心目里，一年当中的大小节日，春节是至高无上的，其次就是元旦。去年元旦没回北京，今年春节也不能回北京了。尽管这些年为了采访和写作在外地东奔西跑，浪迹萍踪，但在异乡过春节还是平生头一遭。当我把写好的论文稿连同衣物塞进手提箱，驱车驶向首都机场，眼望窗外自己从小时起就串遍了的街巷，心中仍怀着依恋的惆怅。

我们乘坐的中国民航一〇一班机于二月六日上午九时从首都机场起飞，腾入一万米的高空，向南直飞香港。

两个半小时以后，飞机降低高度，穿过低矮的云层。十一时四十五分，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地面温度摄氏十五度，整个香港弥漫在蒙蒙的细雨之中。

劝 告

“理由先生，请你不要轻易下笔写香港！”
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崇基学院，我走下讲台，

一群热情的听众围上前来，有的要求签名留念，有的用闪光灯在拍照。当我从人缝中穿出，走向演讲厅的大门时，浑身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就在这时，一位年轻的女士拦住我，说了上面的话。那口气象是庄重的警告。

我端详了一下，对方中等身材，一头披肩的长发，方脸庞，尖下颏，眉宇间似有一股凛然的英气。她的口齿清爽，第一句话就单刀直入，象是一位很有个性的女士。

不错，刚才在讲台上我讲过要写香港。那是在回答听众的提问时，有人问及报告文学是否具有新闻性，哪些题材值得作家们去涉猎？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主张报告文学应去写被当代社会所关注的课题。写人物也可，写事件也可，或用广角镜头摄取社会与人生的画面，这些都可揽进报告文学家写作的视野。我讲到约翰·里德、爱德弥勒、斯诺和基希……还讲到美国当代作家特克尔。我说，香港就值得一写，倘若能有充足采访条件的话；题目也脱口而出：《香港——我的直觉》。

这位女士直言不讳的劝告正是针对我前面的话而说的。

我笑了，反问道：“我为什么不能写香港呢？”

她说：“这个题目很难写好。你在写香港今天的时候，不能隔断它和昨天的联系。”

我问：“那么，你了解香港吗？”

她的脸上掠过沉思的神情：“我是从内地来的，经历了一番痛苦才认识香港的。”

“多谢你的提醒。”我说：“你的话引起我的兴趣，我们似乎有必要详细谈谈。”

她点了点头。我把电话号码留下了……

其实，这位女同胞善意的提醒何曾不是我反复权衡过的问题？

前年来香港时，打点行装，稍加思忖，我干脆连一个采访本也不带，这对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人来说是罕有的举止。自三十年代以来，香港就是大陆文人频频过往之地，曾有许多文化界的前辈在这里久居、滞留或徘徊，在香港写下许多有价值的文字，风土人情的描述、忧国忧民的抒臆、深刻精微的社会剖析……他们比我更了解香港。而我，主要的任务是参加学术讨论，在港期间每天去应对唇枪舌剑的文学纷争，写作的事想也没工夫去想；如同小孩子家打醋——直去直回。返回内地后，中国笔会中心曾两次来信征集出访会员们的作品，我只得交上一纸空白。

也就是上一次，我在香港见到一个奇异的现象。翻开香港的报刊，每天都充斥了对内地情况的大量报道。有褒有贬，评头论足，有的则以纯客观为标榜。这些报道题材之广，速度之快，好象比内地人更熟知内地的内情。

香港人对大陆表现出深切的关注、敏感的好

奇、执着的探究，使你每天都得应付来自四面八方的提问，实际常常是有来无往，还累得人够呛。有一天，终于恍然有悟，为什么只顾由别人来问我，而我不去问问别人呢。你问我也问，你记我也记，彼此彼此，岂不更妙！

所以，这次到香港来随身揣着一个采访本，胸前插着一支圆珠笔，肩上挎着一架新闻摄影机。随时准备和香港的朋友们礼尚往来。

我要写香港，尽管有人比我更熟悉它，尽管它是那样扑朔迷离、是非纷纭，深不可测，在听了那位女士的劝告之后仍未动摇。每个人接触它的深浅层次不同，各有各的角度。我只写这一瞬间的香港，反映在我的视网膜上的香港，引起我的大脑皮层兴奋或抑制的香港——属于“我”的香港。

想起马雅可夫斯基

我们的车子驶出启德机场，拐了几个弯儿，穿过新界的几条街道，在通往沙田的公路上疾驰。

刚才在香港海关过境的时候，没有任何耽搁，甚至没和海关人员之间有过对话。在入口处站着一位妙龄靓女，身着深蓝色的西式上衣和短

裙，风姿绰约，亭亭玉立，向我们几个人微微一笑，就算是“请君入境”了。我们领取了随机托运的行李，左右环视，在大厅的一角整齐地排放着许多手推车，便把手提箱装在车上，自推自运，一切都是自我服务。我们来到海关办公的窗口，递过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务护照，对方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本人的面孔，随即盖了几个图章，很快把护照送还我们的手中，前后不过一分钟的工夫。

如此简便的手续，使人感到轻松、痛快，舒舒服服的。我推着车子向出口走去，在恬静的气氛中油然产生一股回味：难道这里的当局对过境管理真的如此松懈吗？想来不大合乎情理。香港是国际口岸，过往的旅客很庞杂，管理者的头脑决不会比我们几个文人的头脑更简单、更天真。我猜，说不定就在我们过境的时候，正有现代化的闭路电视设备观察着我们的一举一动，甚或把我们几位的容貌拍成照片，编成号码，“咔嚓”一声，贮入了电脑。留个纪念也好，这样做倒是顺理成章的。

外松则内紧，外紧则内松，世界各国的治安管理各有特色。究竟哪一个更好些？各见仁智。不过，我想对于绝大多数的访问者来说，有的是为寻亲探友而来，有的是参加严肃的学术讨论，有的是前来旅游观光寻个开心……谁也不愿意在过境时被搞得神经过分紧张、兴味索然，宁肯落

得逍遥自在……

我们的住处安排在香港中文大学，那里远离喧闹的市区，位于新界的沙田。汽车驶上蜿蜒的公路，一侧是陡峭的山崖，路面很窄，车子开得速度却很快。雨在下个不停，路面湿漉漉的，象一条湛青色的带子向远处伸展……

香港的交通规则和大陆相反，按照英国的规矩，车子一律靠公路的左侧行驶。路面上划有一道白色的中心线相隔；超车时，司机往往把车子开到中心线的那一边去。我熟悉内地的交通规则，乘惯了靠右行驶的汽车，固有的概念一时调整不过来，在这里乘车真叫人头晕目眩！当一辆疾驰的汽车从迎面开来，我的心中立刻做出本能反应：“向右！向右！”可是，两辆对开的汽车都不向右回避，看上去几乎就要迎头相撞了，急得人手里捏一把冷汗。霎那间，两辆车紧贴中心线，如闪电般相擦而过，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想：这时如果方向盘握在我的手里，非得闹出车毁人亡的新闻来。

右乎？左乎？跑过一段路，渐渐就能适应了。但在山脚下崎岖的公路上行驶仍不免感到惊心动魄。这里的弯道拐得很急，有时被前方的石崖遮蔽了视线；冷不防，迎面窜出一辆汽车来。这时，我的心中默默地念叨：“向左！向左！”好象在替身旁的驾驶者加把劲儿似的。

念着，念着，自己忍不住笑了。我猛然想

起，这不是马雅柯夫斯基风靡一时的诗句么！

“文革”初期，马诗人的警句在北京差一点儿就得到彻底实践。记得当年“红卫兵”曾贴出告示，批判右行的交通规则是修正主义路线的阴谋，要把中国引向复辟之路；勒令一切交通工具改为靠左行驶，以象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中学生们走上街头，手里执着小红旗指挥交通，搞得汽车司机们无所措手足。有的司机干脆谁也不得罪，遇见那些器宇轩昂的小家伙就向左开，遇见坚守岗位的警察就向右开，全市的交通乱成了一锅粥。

据说当局者为这件事着实伤了一番脑筋，正儿八经地讨论过好一阵子。最后有权威人士站出来发话，才判断交通规则的细节与社会主义的大政并无直接瓜葛……

哎，排难解纷，何必那么费劲呢？这是我在香港公路上受到的启发，医治浅薄，对症下药就灵。当时若把倡议者请到这里来看看，指出他的倡议有“步资本主义后尘”之嫌，管保他噤若寒蝉，从此再不敢胡折腾。

大 学 宾 馆

我们到香港时，听说英国皇室的安妮公主将

于不久访港。据香港报载，港埠当局为她来访的身份大伤脑筋，因为这位高贵的公主同时兼有许多头衔，例如任驻港英军十四轻骑兵团和第二十英皇轻骑团名誉上校，又系皇家通信团名誉上校，还是伍斯特郡步兵团名誉上校……披露者不无嘲讽地说，如果安妮公主用“英皇第十四轻骑兵团名誉上校”的身份，到时第二十兵团、皇家通信团等不免会大有意见，建议接待者无需牺牲好多脑细胞——用一个公主的身份就得啦！

我们一行三人都没把接待“规格”放在心上。可是，当主人为我们安排的住所呈现在眼前时，仍感到有几分凄凉。

我们落榻之处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大学宾馆，从车子驶过的盘山道看去，它位于一块小小的洼地。一座乳白色的建筑物，显得那么低矮、陈旧、呆板，在细雨空荡的山色中一点儿也不起眼。它的造型太简约了，一个方块衔着另一个方块，设计师悭吝得不肯多用一根线条，好象孩子们玩旧的积木散落在山坡上。宾馆的门前有一片空场，水门汀铺设的地面，环绕着两块不规则的草坪，看不到一棵象样的树木，给人空荡荡的感觉。只有一挑孤灯，仿佛医生用的木签顶着酒精棉花球，倒插在门前的草坪上。

我们迈下汽车，身上淋了几滴雨。这里的雨却很可爱，虽是腊月时节，那雨沾衣欲湿，拂面未寒，清清爽爽的，使人想起江南三月的杏花

天。

我们忙着搬行李，认房间，一位穿着随便的年轻女士向我们交待了几句住客须知，便悄然告退了。我和贺教授同住一个较大的房间，收拾停当，看看周围，才觉得有些异样。

房间里的陈设称不上豪华，却相当舒适、考究。两张大型的席梦思，罩着丝光闪闪的搭单，色调淡雅。衣柜嵌在暗壁里，打开一看很宽敞，足能装进几个活人。梳妆台设在通向卫生间的过道的一端，几乎不易被发现，用起来却很方便。这里的一切布置似乎都不事声张，无意炫耀，在漫不经心的设计中深藏着刻意的追求，给人以无拘束的享受。想必这幢房子最早的主人与设计师达成默契，经过从简单——复杂——简单的哲学式的营运。

据说，这幢房子是以前的一位大学校长的寓所。

香港建筑物的格调有许多是浮华、富于装饰性的。记得我初次游览香港市容时，沿途只见米黄色的、桔红色的、咖啡色的、豆绿色的、天蓝色的各式建筑，从港岛、九龙向新界延伸。其实，那些建筑物的内部未见得都很高雅，即使一间小小的茶室，门前也张扬着花花绿绿的广告，高悬着流光溢彩的霓虹灯，向过路的人们招徕。有一次我应邀去赴新闻界举办的宴会，由于不认路，看错了门牌，误入繁华似锦的中环路的一幢大